

目錄

繁體字版序

自序

外交十記之一	中蘇關係正常化	◎ 一
外交十記之二	柬埔寨問題的巴黎會議	◎ 三三
外交十記之三	飛往巴格達	◎ 五五
外交十記之四	東京的「葬禮外交」	◎ 八七
外交十記之五	通往漢城	◎ 一一三
外交十記之六	黑雲壓城城不摧	◎ 一三七
外交十記之七	從蘇聯到俄羅斯	◎ 一七五
外交十記之八	非洲情結	◎ 二一一

外交十記之九	涉台外交的兩次鬥爭	◎ 二五五
外交十記之十	港澳回歸	◎ 二八三

附錄一 在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五篇演講

◎ 三一七

經濟全球化和其他	◎ 三一八
談談國際關係研究	◎ 三三二
當前國際形勢的若干問題	◎ 三四四
「九·一一」之後的美國	◎ 三六三
伊拉克戰爭與美國	◎ 三七五

附錄二 在中美關係研討會上的主旨演講

◎ 三九三

外國人名索引

◎ 三九九

後記

◎ 四一九

重印說明

錢寧 ◎ 四二〇

繁體字版序

《外交十記》出版問世後，海外華文媒體有的連載、節錄，有的報道、評論。我對各方對這本書的關注和支持，深表感謝。

為了港、澳、台同胞和海外華僑華人閱讀的方便，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了此書的繁體字版。

世界上使用的語言有上百種，但像漢語這樣分用簡體、繁體、橫排、直排的，還未見過。尤其是外國人的姓名漢譯，差別較大，常引起讀者的困惑。如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香港譯為戴卓爾夫人；英國外交大臣傑佛里·豪，香港譯為賀維；而另一位赫德，香港譯為韓達德，等等。看來，繁體字版的出版，還是有需要的。為了使兩種版本更好銜接，外國人的姓名漢譯採用同一方式。但考慮到讀者的方便，繁體字版中，外國人姓名第一次出現時加注了外文。

在《外交十記》繁體字版問世之際，附錄中增加了一篇作者新近在美國德克薩斯農工大學舉行的中美關係研討會上所做的主旨演講。

海外有評論文章說我的記憶力驚人，「全憑記憶」寫了十多萬字的《外交十記》。這可能是書裡自序中的一句話引起了誤會。我在自序中說的「不留片言隻字，一切只憑記憶」，是指當年地下工作時的情況。做外交工作，離不開文件、照會、會談記錄等。寫這本書時，也請助手幫助查找當年的檔案資料，下筆行文，力求準確無誤。《外交十記》之「記」，不僅是個人記憶之「記」，更是史實記錄之「記」。

作者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自序

二〇〇三年三月十八日，全國人大換屆大會閉幕，我從領導崗位退了下來。新老交替，符合自然規律——而且是有利於國家發展、社會前進的規律。老幹部退下來本身，就可以看做是對革命事業的一種貢獻。

我已經七十五歲，超期服役，退下來只想有時間，看些以前想看而沒時間看的書，做些以前想做而沒時間做的事。

今春，興之所至，曾做五言詩述懷，其中有這樣兩句：「有情敘往事，無官開新卷。」

所謂「開新卷」，不一定只是讀新出版的書，只要是沒有讀過的書，對我都算是新書。先秦諸子，百家爭鳴；希臘先賢，廣場辯論；文、史、哲、傳記、回憶錄，都是人類智慧。像英國科學家霍金《時間簡史》這樣的「天書」，雖然難懂，讀了也啟發思想。人們常說要改造世界觀，看來，還要

改造宇宙觀。宇宙之大，無邊無盡，萬物自有規律，人不應被自己的經驗和思想所束縛。

再說「敘往事」。我從不記日記，這是年輕時七年地下黨工作養成的習慣，不留片言隻字，一切只憑記憶。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始到新世紀初，這二十多年的中國外交，確實經歷了嚴峻的考驗，走過了不平常的道路。作為參與者，回顧起來，往事歷歷在目，一些親身經歷的場景，猶如電影中的特寫鏡頭，在腦海中不斷縈回。現在將自己親身經歷的一些事件，平實白描地寫下來，不求面面俱到，只求真實準確，非史非論，故稱之為《外交十記》。

是為序。

二〇〇三年七月三十日

◎ 外交十記之一

中蘇關係正常化

重大決策

一九八二年五月，我出任外交部副部長，開始主管蘇聯、東歐事務。

當時，中蘇兩國正處於嚴重的對抗局面：蘇聯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和漫長的中蘇邊界線上陳兵百萬；七十年代末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又出兵入侵阿富汗。這對我國的國家安全形成了直接威脅的態勢。

俗話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不計歷史舊賬，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的三十年間，中蘇兩國經歷了三個「十年」：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九年可以說是十年論戰；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九年是十年對抗；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年是十年談判。這期間，既有冷戰又發生過熱戰。

但就在一九八二年初，出現了一些微妙的跡象，中蘇關係開始醞釀某種變化。

事情要從那年的三月二十四日說起。

那天，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Брежнев, Леонид Ильич）來到蘇聯的中亞地區，在烏茲別克共和國首府塔什干發表了長篇講話，其中，雖然仍充滿了對中國的攻擊，但明確承認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強調了中國對台灣的主權，並表示願意改善對華關係，建議雙方磋商，採取一些兩國都可以接受的措施，以改善中蘇關係。

鄧小平同志馬上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講話所傳遞的信息。當時，中美之間有關美國售台武器問題的會談取得了進展，「八·一七」公報——即中美之間三個公報中的第三個公報——即將簽署。中美兩國關係的新框架可以說基本確立，着手改善中蘇關係的時機正在成熟。

我們當時的分析是，由於蘇聯入侵阿富汗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全球範圍內與美國的爭奪日趨緊張，蘇聯已感到力不從心，不得不實行戰略調整，而緩解對華關係正是其中的一個重大步驟。這在客觀上為我們調整對蘇聯政策提供了機會。

小平同志打電話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對勃列日涅夫的講話做出反應。那時，外交部還沒有正式的新聞發佈會制度。我仍在新聞司司長的任上，正在考慮設立新聞發言人，此事便成了立刻建立發言人制度的契機。

外交部的第一次新聞發佈會是一次沒有座位的新聞發佈會。那是三月二十六日，地點在當時外交部主樓門廳處。當時沒有專門進行新聞發佈的場地，七八十位中外記者受邀出席，大家就站在我周圍。當時擔任翻譯的是現任外長李肇星。

作為外交部首位新聞發言人，我發佈了一個只有三句話的簡短聲明：

「我們注意到了三月二十四日蘇聯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發表的關於中蘇關係的講話。我們堅決拒絕講話中對中國的攻擊。在中蘇兩國關係和國際事務中，我們重視的是蘇聯的實際行動。」

聲明唸完後，沒有提問，也不回答問題。第一次新聞發佈會就結束了。

這個沒有先例的新聞發佈會和三句話的簡短聲明，立即引起了在京的中外記者的極大關注。

出席發佈會的蘇聯記者當場豎起大拇指，對我說：「奧慶哈拉索！」（很好！）他顯然聽出了聲明中不同尋常的意思。

三句話中，重要的是兩個詞，一個是「注意」，一個是「重視」。實際上，就是「聽其言，觀其行」之意。其言可聽，自然是說，你講的話中間，有合理的成份。以前，中國對蘇聯所說的一切，只有全面批判，哪裡會聽，更說不上「觀其行」了。現在要「觀其行」，是要對方拿出實際行動來。

這簡短的聲明，第二天發表在《人民日報》頭版的中間位置，表明消息雖短但很重要。聲明在國際上也立即引起了廣泛注意。西方五大通訊社和其他外國媒體紛紛報道，並發表評論。有外電指出，這一謹慎而含蓄的聲明，預示着對抗了三十多年的中蘇關係，有可能發生變化，並使世界局勢為之改觀。

這是我以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的身份，主持的第一次新聞發佈會，也是最後一次。外交部的新聞發佈會從此成了慣例，每周舉行。不過，不再是站着舉行了，而是移到了國際俱樂部，記者可以坐下來了。後來，外交部建了新樓，有了專門的新聞發佈廳。

這年盛夏的一天，小平同志邀集幾位中央領導同志和外交部主要領導到他家開會，研究中蘇關係問題。陳雲、李先念等老同志在場，我作為外交部主管蘇聯、東歐事務的副部長也列席參加了。

小平同志提出，要採取一個大的行動，向蘇聯傳遞信息，爭取中蘇關係有一個大的改善，但中蘇關

係的改善必須是有原則的，條件是蘇聯得做點事情才行。這就提出了要蘇聯主動解決「三大障礙」，即從中蘇邊境地區和蒙古人民共和國撤軍；從阿富汗撤軍；勸說越南從柬埔寨撤軍。

大家一致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見。

中蘇兩國長期論戰，一直在爭論誰對誰錯，我們說蘇聯是修正主義，蘇聯說我們是「教條主義」，雙方的調門越來越高。這次，小平同志提出的中蘇關係改善的條件，卻將現實問題的解決置於首位，重點由意識形態的爭論轉向了國家利益的考慮，顯示出日後中國外交政策調整的趨向。

陳雲同志提出了採取什麼方式傳遞信息的問題。信息的傳遞，既要引起對方的注意，又要不引起外界猜疑。如果召見使館人員或派人前去訪問，恐怕過於正式，而當時中蘇之間又沒有什麼其他的接觸渠道。

小平同志提議，為了不引起外界的無端猜測，可由外交部蘇歐司司長以視察使館工作名義前往莫斯科，並同時前往波蘭華沙。當然，第一站莫斯科是此行的主要目的地。八月十日，蘇歐司司長于洪亮啟程赴莫斯科。在他啟程前，我們根據小平同志指示，起草了一份說帖。

蘇方對我們蘇歐司司長突然出現在莫斯科，並要求在使館面見蘇聯外交部副部長的行動，給予了特別的重視。蘇聯外交部副部長伊利切夫（Ильичев, Леонид Федорович）應邀來到我國駐蘇使館，第一遠東司司長賈丕才（Жаппа, Михаил Степанович）特地中斷休假，從莫斯科郊區別墅急忙趕回，陪同前來。

會面時，于洪亮同志向對方口述了長達一千多字的說帖全文，一段段地背出來，幾乎一字不差。在說帖中，中方指出，中蘇兩國關係不正常狀況已經存在多年，中蘇兩國人民都不願意看到這種狀況繼續存在下去。現在是為改善中蘇關係做一些事情的時候了。當然，問題不可能在一個早上就解決，但中方認為，只要中蘇雙方都有改善關係的誠意，完全可以通過協商，逐步實現公正合理的解決。中方建議先從蘇聯勸說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做起，也可以從解決影響兩國關係的其他問題，如減少中蘇邊境地區武裝力量做起。與此同時，雙方還應考慮找到一個有關各方都能接受的解決辦法，來解決蘇聯從蒙古人民共和國撤軍的問題。中方也希望在阿富汗問題上能找到合理的解決辦法。總之，只要雙方站得高，看得遠，有使兩大鄰國恢復睦鄰關係的誠意，從解決一兩個重要問題入手，就可以為兩國關係打開一個新局面。至於交換意見的形式，雙方可以協商。

伊利切夫眯着眼睛仔細聽着。他資格很老，赫魯曉夫(Крушев, Ни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時期曾任蘇共中央書記，當過蘇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和《消息報》、《真理報》主編，長期主管意識形態工作。赫魯曉夫下台後，他退出中央領導位置，就任外交部副部長。他為人穩健，處事謹慎，說話時字斟句酌，給人的印象是過於嚴謹而稍欠靈活。聽了我方的說帖後，他做出的回應仍是慣常的外交辭令。他說，你的想法，不管是從內容上，還是從主動的方式上，都不可能不引起注意。同時，又做出了老一套的表態，好像並未完全覺察出中方信息的真實含義。倒是當時在座的中國通賈丕才比較敏感，捕捉到了說帖中的新和準備回答的時間。

這次會見以後，于洪亮即轉赴華沙，以此向外界表明此行不是專程來莫斯科的，同時也給蘇方考慮東西，表示這件事可能起到某種積極的推動作用，並說，這樣重大的問題不是我們這些人所能解決的，要報告政治局和最高領導。

八月十八日，當于洪亮重返莫斯科再次會見伊利切夫時，伊利切夫談話的態度有所變化，口氣也緩和多了，稱已將中方的想法報告了中央，蘇方將做出正式答覆。

八月二十日，蘇聯第一副外長馬爾采夫(Малышев, Бирюков)約見我國駐蘇使館臨時代辦馬敘生，交來一份作為正式答覆的備忘錄，表示蘇方願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級別上同中方討論蘇中雙邊關係問題，以便「消除關係正常化的障礙」。

蘇方也提出了「消除障礙」，這與中方的提法是相吻合的。我們認為，蘇方對我方信息的反應是積極的。小平同志隨後找我和于洪亮去他家裡，親自聽取了有關傳遞信息的詳細匯報，當即決定同意重開中蘇談判。

在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中共十二大開幕前，中蘇雙方已內部商定，由兩國副部長級政府特使就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舉行政治磋商。

磋商開始

一九八二年十月，中央委任我為中國政府特使，參加中蘇政治磋商。對我來說，這是一次重要而又極富挑戰性的使命。蘇聯政府特使，也是我的談判對手，就是那位伊利切夫。作為主管非洲事務的蘇聯外交部副部長，伊利切夫從未主管過中國事務，但卻同喬冠華、韓念龍、余湛、王幼平四位中國副外長先後進行過長達十年的中蘇邊界和中蘇國家關係談判，被蘇聯外交界視為談判高手。

第一輪磋商於一九八二年十月五日開始在北京舉行。我們一開始就對磋商做了長期較量的思想準備。遵照小平同志關於同蘇聯打交道，彎轉得不要太急，不要急於求成，太急了會為蘇所用的指示和十大報告所闡明的對蘇原則立場和政策，我們擬定了此次磋商的方針，即立足戰略全局，堅持原則立場，着重提出要求蘇聯認真做些事，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促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同時，在策略上，舉起改善兩國關係和維護中蘇兩國人民友誼的旗幟，以保持磋商的渠道。

第一輪磋商進行了半個月，從五日開始到二十一日結束，共舉行了六次會議。談判中，我抓住消除「三大障礙」問題不放，指出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的根本途徑在於雙方共同努力，紮紮實實做一些事情，以消除妨礙發展兩國關係的嚴重障礙。障礙消除了，通向正常化的道路就暢通了。沿着這條道路前進，就可望逐步恢復兩國之間的睦鄰友好。

伊利切夫則反覆重申改善兩國關係的願望，但對我們所提出的「三大障礙」，則盡力回避，拚命反駁。蘇方的論點也主要有三個：一是指責中方為磋商設置「先決條件」；二是提出中蘇關係正常化，應當「不損害第三國利益」；三是宣稱蘇方「從不威脅中國」。他一再建議共同制定蘇中關係基礎文件，先就促進經貿、科技、文化等各個領域關係的改善和發展達成協議。

針對伊利切夫把中方提出消除障礙稱之為是「先決條件」，我指出，不存在什麼先決條件。我們提出來希望討論的某些問題，不是先決條件。如果事先確定哪些問題可以提出討論，而另外一些問題不能討論，這在客觀上等於設置了先決條件。在磋商過程中，對所有問題進行無拘束的討論，正是沒有先決條件的表現。

針對蘇方所主張的「不損害第三國利益的正常化」，我告訴伊利切夫，中方提出來討論的一些問題不是有損而是有利於蘇方所說的第三國利益，同時也有利於改善我們同這些國家的關係。蘇聯特使在第一次發言中提到，中國和蘇聯是兩個大國，中蘇兩國的關係會影響到亞洲和世界的局勢。那麼，在磋商中是會涉及第三國的。問題在於，是有損於這些國家的利益，不利於改善同這些國家的關係，還是有利於這些國家的利益，有利於改善同這些國家的關係呢？我進一步指出，只講改善中蘇關係不應損害第三國顯然是不全面的，作為一個原則，我們主張不損害所有第三國利益。

對於蘇方宣稱從不威脅中國，我指出，蘇聯在中蘇邊境、在我們共同的鄰國蒙古人民共和國和阿富

汗駐紮大量軍隊，把那麼多用現代化武器裝備起來的軍隊擺到我們面前，我們當然感到了實實在在的威脅和嚴重不安。

我特別就消除「三大障礙」從何入手問題做了重點闡述。我說，我國領導人在我們黨的十二大報告中列舉了妨礙中蘇關係正常化的一些障礙。消除這些障礙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到的。我們認為，首先從解決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問題做起，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這是因為：第一，從這裡入手是至關重要的。坦率地說，越南在蘇聯的支持下派軍隊佔領柬埔寨，不僅給柬埔寨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給越南人民帶來了不應有的痛苦和犧牲，使東南亞地區的和平與安寧遭到了戰火的破壞，而且加重了中國的不安全感，使本來惡化了的中蘇關係變得更加緊張、尖銳和複雜，為中蘇兩國關係的正常化設置了新的嚴重障礙。盡快解決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問題，是維護東南亞和平與安全的急迫需要，是實現中蘇兩國關係正常化的一個關鍵性步驟。第二，從這裡入手也是比較現實可行的。眾所周知，蘇聯在印度支那地區所做的不光是支持越南出兵柬埔寨這樣一件事情。蘇聯方面想來應該注意到，我們沒有苛求蘇方，現在我們所提出的僅僅是要蘇聯運用自己的影響促使越南從柬埔寨撤出軍隊。在這裡，不存在蘇聯自己撤出一兵一卒的問題，也沒有涉及別的東西，雖然我們完全可以要求蘇聯方面做些別的事情。中國方面這種合情合理的主張，應當能夠得到蘇聯方面的積極響應。人們也都清楚，蘇聯擁有促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的能力和手段。如果蘇聯方面冷靜地權衡利弊，具有遠見，做出政治決斷，並採取必要措施，問題並

難解決。

至於蘇聯堅持先從共同制定蘇中相互關係原則文件做起的問題，我告訴伊利切夫，中蘇關係正常化不是簡單地發表一個表達這種願望的聲明或文件就能辦到的。這正好從實質上說明，中國方面對擬訂兩國關係原則文件是真正重視的並持慎重態度的。我們認為，當兩國都用自己的行動證明我們都忠於所主張的原則，並都遵守這些原則的時候，兩國關係原則文件就擺到了我們面前。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這就是說，中蘇兩國關係原則文件只能是兩國關係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它應當是從兩國關係的具體實踐中歸納出來，並用以指導兩國關係的東西。因此，我們認為，現階段我們雙方最迫切的任務，或者說我們雙方的主要精力，應當放在紮紮實實做一些消除兩國關係發展障礙的實際事情上，為將來擬訂兩國關係文件創造條件。

整個磋商過程中，雙方針鋒相對，唇槍舌劍，氣氛有時很激烈，雙方都是事先準備好稿子，相互批駁。伊利切夫由於長期主管意識形態工作，自己還是哲學博士，當時正在編哲學辭典，發起言來，不但態度強硬，而且很有理論色彩，喜歡長篇大論，咬文嚼字，繞來繞去，但教條而空洞，令人不勝其煩。後來，他曾專門送給我一本他編寫的哲學辭典，顯示出他的理論功底。當然，中方對他也毫不客氣，常常高調回應，將蘇方的主張稱之為「水中月」、「鏡中花」，強調不解決「三大障礙」而想改善中蘇關係，那完全是癡心妄想。

磋商期間，除了正式談判外，還有許多遊覽參觀活動，雙方可以非正式地交換意見。在外交鬥爭中，有些話必須在正式場合說，有些話卻可以在下面說。正式場合講的正式的話，未必重要；而非正式場合講的非正式的話，未必不重要。另外，正式場合吵夠了，在下面可以稍稍客氣一些，有些信息，雖不入記錄，卻可直接地傳遞給對方。

為了給緊張的磋商創造一點寬鬆的氣氛，我特意邀請伊利切夫及其隨行人員一同遊覽密雲水庫，到那裡呼吸新鮮空氣，賞景嘗鮮，並增加雙方的交談和接觸。伊利切夫說他以前去過那裡，只吃過魚，但沒在那兒釣魚。看來，他心存疑慮，有點擔心怕我們引他上鉤。但他感謝我的邀請，說這樣可以給他時間考慮考慮磋商中的問題，以便答覆我們。

遊覽水庫那天，秋高氣爽，風和日麗，觀千頃碧波，看鳶飛魚躍，令人心曠神怡。在品茗賞景之時，我對伊利切夫說，希望蘇方能正確理解我方的意見，中方發言中有新東西。比如，在減少中蘇邊境地區的武裝力量問題上是雙方承擔義務。在蘇聯從蒙古撤軍問題上，我們提出應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解決辦法。我們只是要求蘇聯促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並不涉及蘇聯與越南之間的雙邊關係。蘇聯支持越南侵佔柬埔寨，不僅使印支地區局勢緊張，而且也給蘇聯造成沉重負擔。解決這個問題對蘇聯、對越南都只有好處而無損害。我們不理解蘇聯方面在這個問題上究竟有什麼困難。

伊利切夫斂容細聽，顯然聽懂了我的話，知道了我方在「三大障礙」問題上的原則立場和解決這些問題的可能途徑。但他毫不鬆口，只是重申了蘇方對「三大障礙」問題的一貫立場。儘管如此，他仍不放心，怕這裡有什麼「圈套」，被視為雙方討論過消除「三大障礙」問題，一再聲明「今天是非正式交談」，建議今後磋商中，「雙方都不要引用此次談話內容」。

中蘇兩國政府特使第一輪政治磋商是一場互相摸底的前哨戰，雙方可以說是爭吵不休，翻來覆去，各說各的，沒有大的進展。但這次磋商啟動了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進程，標誌着不對話狀態的結束，預示着兩國關係將由長期緊張轉向長期對話。

打持久戰

中蘇第二輪政治磋商於一九八三年三月在莫斯科舉行。在會談中，雙方在探尋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上依舊各說各的，在實質問題上沒有找到任何共同語言。

在這次磋商期間，我與蘇聯外長葛羅米柯(Громыко, 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ич)的會見和交鋒頗具意味。葛羅米柯擔任蘇聯外長達二十七年之久，從斯大林(Сталин, 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到契爾年科(Черненко, Константин Устинович)，歷經五代蘇聯領導人，人稱「不倒翁」。他有着一副西方人所说的「撲克牌面孔」，就連聽人說話時也面無表情。不論什麼場合，他都顯得十分矜持，但又十分好鬥，似乎隨時準備跟人進行一場外交角鬥，也被西方記者形容為是一位「說『不』的先生」。

會見時，他竟接過我方反霸和消除威脅的主張，令人驚奇地聲稱，此點可成為兩國實現關係正常化的重要基礎。接着，他大罵了一通美國人，說美國人不可信，又說美國要對蘇聯進行十字軍遠征，里根(Reagan, Ronald)總統要從地球上鏟除社會主義，並以教師爺的口吻說，中國完全可以從美國推行的消滅社會主義的政策中，推導出應該同蘇聯還是同美國建立何種關係的結論。

當時，他年事已高，有點倚老賣老，我對他的這番議論做了簡單明確的回應。我說：「談到國際上的緊張局勢，這是客觀存在。我想在這種形勢下改善中蘇關係不僅符合中蘇兩國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亞洲、世界和平的利益。至於談到美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同美國進行過長時期的較量，我們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資格講話，知道如何同美國打交道。」葛羅米柯一時語塞，顯得有點尷尬。

此後，中蘇兩國政府特使政治磋商每年兩次，分別在北京和莫斯科輪流舉行。這是一場馬拉松式談判，是韌性和毅力的較量。我們始終堅持只有排除障礙才能實現中蘇關係正常化的原則立場，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式駁斥蘇方一成不變的論點，破除蘇方的幻想，力促蘇聯在消除障礙問題上有所作為。但直到一九八六年四月在莫斯科結束第八輪政治磋商，雙方仍沒在「三大障礙」問題上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不過，磋商得以繼續下去，保持了一個溝通的渠道，客觀上對中蘇雙邊關係起着推動作用。

回想起來，磋商沒有取得具體進展，也有其他原因。在此期間，蘇聯國運不昌，幾乎每一兩年就要死一位領導人，三位領導人勃列日涅夫(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日)、安德羅波夫(Андропов, Юр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一九八四年二月九日)、契爾年科(一九八五年三月十日)相繼病逝。據說，勃列日涅夫到了晚年，每天只能工作一個小時，打打電話，無法正常視事。接任的安德羅波夫，人聰明而精幹，當過蘇聯駐匈牙利大使，知道外部世界的情况，想有所作為。他痛感蘇聯政府官僚主義泛濫，人人愛喝酒，而不認真做事，認為喝酒誤國，下令禁酒，把酒廠改為果汁廠，並四處嚴查酗酒。但不喝酒不符合蘇聯的「國情」，難以實行。他重病纏身，只當政了一年多。契爾年科上台，不想，他病得更重，身體更壞，執政的時間更短，做不了任何事。

病夫治國，其主三易，對外難有作為，自然一時無力解決中蘇關係正常化這樣重大的問題。有意思的是，中蘇兩國的接觸卻因三次蘇聯領導人的葬禮而提高了級別。

當勃列日涅夫去世的消息傳來後，小平同志立即指示派黃華外長作為政府特使赴莫斯科參加葬禮。這是在中蘇高級接觸中斷多年後所採取的非同尋常的舉措，旨在抓住時機做蘇方工作，試探新領導的對華政策走向，推動中蘇關係正常化進程。黃華啟程以後，小平同志又指示，要發表一個簡明的談話，對勃列日涅夫既不要簡單批一頓，也不能光說好話。按照小平同志的意思，胡喬木同志起草了談話稿。談話回顧了中蘇關係的演變過程，指出中蘇關係從五十年代後期就逐漸惡化，六十年代末以後，這種惡化達到了嚴重的地步。六十年代末以後正是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勃列日涅夫對中蘇關係嚴重惡化是負有責任的，但考慮到這次活動是弔唁，就沒有點名。同時，對他不久前關於改善兩國

關係的講話表示讚賞，這是寄希望於蘇聯新領導做出新的努力，促使中蘇關係得到改善。這篇稿子作為黃華離開首都機場時對記者的談話發表了，同時外交部立即將此事通知我國駐蘇使館。黃華外長到了莫斯科才得知他離京時還有這樣一篇公開的談話。

這一次，黃華外長見到了蘇聯新領導人安德羅波夫和葛羅米柯外長。中方強調要使兩國關係得到真實的改善，蘇聯必須在消除障礙方面採取實際步驟，先做一兩件事。而蘇方雖然表示願意改善兩國關係，卻只強調雙方應先做出努力，促進經貿、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來往。看來，蘇聯新領導將繼續勃烈日涅夫開始的改善兩國關係的勢頭，但還未下決心採取重大步驟。

隨後兩年內，我先後陪同萬里副總理和李鵬副總理赴蘇聯參加了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的葬禮。中方利用高層接觸機會再次做出努力，在談話中，對蘇聯建設社會主義事業予以評價和支持，推動蘇方在實現中蘇關係正常化方面拿出實際行動。

在正式的各輪磋商中，中蘇雙方就像聾子對話，完全對不上。雖是相互扯皮，達不成任何共識，但扯皮也有扯皮的意義。首先是雙方對各自的立場和觀點有了更充分的了解；其次，是扯皮本身使得雙方關係沒有更緊張下去。

總之，不斷扯皮比互不往來要好。扯皮多了，交往也就慢慢多了起來。那時，有人形容兩國關係是一個使館、一架飛機、一列火車。說的是兩國關係只剩下這些聯繫，雖保持外交關係，而且天上通航，地上通車，但來往很少。有時，從蘇聯回國，整個航班和列車車廂裡都是空空蕩蕩的，看不見幾個人。隨着中蘇政治磋商的持續進行，兩國的經貿增加了，在其他方面交往也增多了，開始交換留學生，組團互訪。

這中間，一九八四年底，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阿爾希波夫(Архипов, Иван Васильевич)應姚依林副總理的邀請對我國進行正式訪問，具有特別意義，這是六十年代後期兩國關係嚴重惡化以來蘇聯派出的最高級別的訪華代表團。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阿爾希波夫擔任蘇聯援華專家組組長，為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做出了貢獻。他對華友好，在兩國關係惡化年代，也從未說過中國一句壞話。中方給了阿爾希波夫很高的禮遇，鄧小平予以接見，陳雲、彭真和薄一波等同他一起工作過的老朋友都會見了他。故友重逢，相見甚歡，情景十分感人。

記得陳雲同志為準備同阿爾希波夫會見，請姚依林、陳楚和我去他住處匯報，談得十分高興。當晚，他手書「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條幅，派人送給我，以陸游的名句，表達他對中蘇關係發展的感受和對兩國關係前景的期望。

阿爾希波夫訪華期間，我全程陪同他參觀了燕山石化公司、武漢鋼鐵公司、武漢長江大橋和深圳特區等地。我不時提起蘇聯援建的一些項目，還向他介紹深圳特區在小平同志直接關懷下，堅持改革開放，取得驚人發展的歷史。阿爾希波夫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和飛速的發展，印象極為深刻，不時由衷

地讚歎，同時也流露出對當時蘇聯社會現狀的失望和不满。

訪華期間，雙方簽署了《中蘇經濟技術合作協定》和《中蘇成立經濟、貿易、科技合作委員會協定》，使兩國中斷多年的經濟和科技合作得以恢復。

一九八五年七月，我陪同姚依林副總理回訪蘇聯。姚副總理同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阿爾希波夫舉行會談，會見了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吉洪諾夫（Гихоно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雙方在發展經貿合作方面談得很順利，簽署了《中蘇關於一九八六至一九九〇年交換貨物和付款協定》等文件，中蘇貿易額則從一九八四年的二十六點五億瑞士法郎增加到一九八五年的四十六億。雙方對兩國的高層交往和貿易的大幅增長表示滿意，我方同時敦促蘇方在消除「三大障礙」問題上拿出行動，指出障礙不消除，兩國關係的改善是有限度的。

談判突破

如何從中蘇關係正常化談判的僵局裡面走出來呢？中方堅持消除「三大障礙」，這是兩國關係根本改善的基礎，而蘇聯的三位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均避重就輕，企圖繞過「三大障礙」，通過發展經貿合作，增加相互往來，實現所謂兩國關係正常化。戈爾巴喬夫（Горбачев, 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ич）上台初期，也無意在克服「三大障礙」問題上向前邁步。

一九八五年十月九日，小平同志在會見訪華的羅馬尼亞領導人齊奧塞斯庫（Ceausescu Nicolae）時指出，解決中蘇關係正常化問題、消除「三大障礙」，首先應從越南從柬埔寨撤軍這件事做起。只要這個問題解決了，其他問題都好解決。為推動中蘇關係取得突破，小平同志首次提出中蘇舉行高級會晤的設想。小平同志請齊奧塞斯庫帶口信給戈爾巴喬夫：如果蘇聯同我們達成諒解，讓越南從柬埔寨撤軍，而且能辦到的話，他願同戈爾巴喬夫會見。小平同志說，他出國訪問的歷史使命雖已完成，但為這個問題，他可以破例。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六日，蘇方答覆說口信收到了。二十三日，蘇方表示，蘇中舉行最高級會晤和恢復黨的關係的時機已經成熟，建議兩國最高領導在蘇聯遠東地區或中國境內舉行會晤，討論蘇中關係正常化問題。

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戈爾巴喬夫在蘇聯遠東城市海參崴發表長篇講話，表示蘇聯願在任何時間、任何級別上同中國十分認真地討論建立睦鄰關係的「進一步措施」。他宣佈，當年年底前從阿富汗撤出蘇軍六個團，蘇聯全部撤軍則取決於外部干涉是否繼續下去，並透露蘇聯正同蒙古研究撤出一相當數量」的蘇軍問題，還表示願同中國討論削減中蘇邊境地區的陸軍。同時，他也談到了柬埔寨問題，聲稱越柬問題的解決取決於中越關係正常化，是中越雙方的事，蘇聯只能希望中越恢復對話，言歸於好。

值得注意的是，他接受了中國在中蘇邊界談判中所持的立場，同意按主航道中心線劃分阿穆爾河

（黑龍江）邊界線走向，希望不久的將來，邊界成為和平友好的邊界。

同戈爾巴喬夫上台後的歷次講話相比，這次講話顯示蘇方的立場有了重要變化。

在「三大障礙」問題上，這次沒有重彈「不設先決條件」、「不損害第三國利益」、「從不威脅中國」等老調，不再回避從阿富汗、蒙古和邊境地區撤軍問題，有所鬆動。在越南問題上，語氣也比較平和，說現在是解決問題的有利時機。

由於歷史原因，中蘇兩國邊界在黑龍江（阿穆爾河）一段，在清朝時，只是簡單地以江為界，沒有嚴格劃定。蘇聯一直站在當年沙俄蠻橫的立場上，聲稱中國的邊界應當劃在界江河的我方沿岸一線。這樣一來，江中的島嶼自然就劃歸了蘇聯，而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成了蘇聯的內河。我方當然不會答應。中國主張，按國際法準則及國際實踐，應當以界江的主航道中心線為兩國國界。一九六九年，中蘇兩國的珍寶島流血衝突，蓋源於此。戈爾巴喬夫的表態不能說不是一個積極的姿態。

同時，作為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也第一次公開肯定了我國進行現代化建設的方針，表示理解和尊重。他還提出了擴大和加深經濟技術合作的具體設想。

中央決定抓住這一時機，採取相應對策，對戈爾巴喬夫的講話表示了審慎歡迎的態度，但在「三大障礙」問題上不鬆口，繼續保持壓力，同時做出積極姿態，接過以主航道中心線為界的提法，同意恢復邊界談判。

為此，八月十三日，吳學謙外長約見蘇聯駐華使館臨時代辦費多托夫（Федотов, Браунманн Паровик），做了如下表態：戈爾巴喬夫總書記七月二十八日海參崴講話中對中國和就中蘇關係所表述的意見，我們予以認真的評價和重視。中方注意到其中有些過去沒有說過的話，對此我們表示歡迎。蘇聯方面清楚地知道中國方面關於消除「三大障礙」以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的原則立場和具體主張，而戈爾巴喬夫這篇講話與消除「三大障礙」距離尚遠，特別是沒有提到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問題，我們是不滿意的。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公正合理地解決柬埔寨問題是中國方面最感關切的問題，也是去年鄧小平同志通過齊奧塞斯庫傳話的核心。中方真誠地希望早日實現中蘇關係正常化，希望蘇方認真考慮中方的意見。對戈爾巴喬夫總書記宣佈中蘇東段邊界以界江主航道中心線為界，中方表示歡迎。據此，中方認為，在適當時候恢復中蘇邊界談判是適宜的。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日，小平同志在接受美國記者華萊士（Wallace, Mike）電視採訪時，又一次談到了中蘇關係，強調指出讓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問題是改善中蘇關係的關鍵，並說，如果戈爾巴喬夫在越南問題上走出紮紮實實的一步，消除了這個障礙，他願意破例地到蘇聯的任何地方去同戈爾巴喬夫見面。我們在九月七日正式對外發表了這一談話，把中方的立場公佈於世，實際上是對戈爾巴喬夫在海參崴的講話做出了公開的答覆。